

暮色中的光明——讀《變化中的中國人》

◎ 秦文佳

《變化中的中國人》，（美）E.A.羅斯，北京：時事出版社，1998年

炎熱的午後，翻開了一本老書——《變化中的中國人》。隨著作者的敘述，時光一下倒流回了1911年前的中國，跟著他的足跡，遊歷中國的大江南北的城市鄉村。在扉頁的作者簡介中寫到：「E.A.羅斯，生卒年不詳，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著名的社會學家。本世紀初曾來中國居留。本書出版於1911年，是辛亥革命前西方觀察中國的代表作。」

整本書涉及的內容很豐富，從談中國人的體格、民族精神、到描繪中國工業的前景、禁煙鬥爭，再到婦女的解放、當時的新式教育等等，所以讀者總能在其中讀到自己感興趣的方面，值得關注的問題。它像一本散文式的紀實遊記，但又不僅僅是異國遊歷的簡單記錄，說它是一本人類學手稿，卻又不像一般社會學論著那般嚴肅。對我們而言它倒更像是一扇窗戶，借一個西方人的視野回望一個東方大國在百餘年前的社會百態。當舊日中國的影像在人們眼中日漸遙遠、模糊，一個在百多年前觀察變化中的中國人的西方社會學家，多少讓我們在當下保持一種清醒。

一 北方人與南方人

衰朽，落後，野蠻，愚昧，這就是在大多數西方人眼中的舊中國。從這些用詞中，我們很難找到這個國家發展自新的希望。不過E.A.羅斯的記錄、闡述、考察、研究，都在極力避免民族的歧視與偏見，儘管偶爾也難免顯露出作為一個文明社會人的姿態。

從對比南方人和北方人的面容體格上的不同，到推測兩者性格上的差異，羅斯顯然是一個優秀的觀察者，而中國南北的差異，可能是令任何一個研究者都難以忽略的，也多少會評品一番。我驚訝於作者的細緻和敏銳，就像我曾經驚訝於另一位西方人類學家斯堅雅對中國四川盆地農村集市的精細考察：「北方人儘管在才智方面不如南方人，但在性格方面比廣東人更穩重、更自信。他們對朋友較南方人真誠。由於他們能夠互相信任，北方人便易於聯合在一起。正因為此，在經營股份公司方面，他們會比機智聰明的南方商人幹得出色」（頁23）。這個論斷的前半部分從今天看來大致也是正確的，但說北方人在經營股份公司方面會比南方商人幹得出色，放到今天可能很多人不會贊同。他自己也提到：「一些精明的上海人正開始涉足這些白人所從事的事業。……他們進步很快，在銀行業、海上交通、棉花交易以及其他部門中，中國人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頁76）另外，浙江商人在今天幾乎遍及全球的足跡也是對南方人經營才能的一個明證。並且，在江浙一帶，一些植根鄉土的民營企業也在不斷壯大的過程中朝著股份化的方向發展完善。

從羅斯對國人的觀察中，我們看到了一個遲暮國度中蘊藏的生機。儘管我們的工商業仍然稱不上繁榮，商業精神仍然沒有充分發揮出來，但百年後的今日，農業已經不再是社會的主導產業。

二 生存壓力與生存鬥爭

書中除了南北方人的比較，更多的是中西方人的比較。羅斯絲毫不諱言中國人的優點：「中國人看問題的方法比西方人更全面，中國人有著更寬闊的心胸，他們鎮定而達觀的忍耐力往往使那些熱切而魯莽的西方人感到無地自容。」（頁68）他甚至認為中國人的體質中有一種獨特的生命活力，比如抵禦疾病，容忍污濁的空氣、承受疲勞的工作，容忍變質的食品和有毒的細菌。這種認識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使國人感到尷尬，或者難堪，但卻真實的反映了當時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的一個側面。高強度的勞作、惡劣的衛生條件、粗濫的食物，難道普通的中國人就不懂得過舒服的生活嗎？難道因為他們能夠容忍惡劣的生存條件就應該忍受這一切嗎？穿著破舊衣服的婦女，背著小孩，守在搬運大豆、大米的路上，等候從袋子裏掉出來的糧食。在卸粗糖的碼頭，當最後一袋糖卸下，「守候者蜂擁而上，將遺落下來的糖連同灰塵一起打掃收拾乾淨」（頁92），「由於擔心饑餓威脅，人們為了一點工資而不顧一切耗盡生命」（頁92）。讀到這些，國人心中如果還湧起半點自豪，那只能顯示一種無知的苦澀。種種事實都在向我們展示百年前中國的普通民眾是如何生存在貧困的邊緣。

為什麼會這樣？羅斯試圖從中國的家庭構成中去尋找答案。他發現，是否有後代，特別是能否得到一個男性後裔，是中國人所考慮的最有價值的東西。由此他推論：實際上，中國貧窮落後的主要原因僅僅在於有限的土地上養活了過多的人口。這裏，作者抓住了一把解釋中國社會的鑰匙，卻又不免落入了馬爾薩斯論調的人口解釋。對當時中國惡劣的生存環境與生存狀態，僅僅用土地與人口的矛盾來分析顯得有些單一，置於更為廣闊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潮流中來理解才可能獲得合理而全面的解釋。

三 社會意識與家產制度

性格上的保守、創造力的缺乏、思想的停滯不前……羅斯認為中國人的智慧沒有得到發揮是由於中國人的社會意識決定的，而不是教育體制。「隨著舊文化和人們集體觀念的消失，許許多多能力很強的人將湧現出來，並會取得相當高的個人成就」（頁60），這不禁讓人聯想到馬克斯·韋伯的文化論，聯想到他那本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不過在以中國為研究物件的《儒教與道教》中，馬克斯·韋伯的觀點顯得更为徹底和明確，在他看來西方封建制的獨特性在於其有效的契約制度，而中國自秦始皇統一以後的制度不具有這種屬性，其統治不是按固定的契約和法則來進行的，因此它不屬於封建制度，而是一種家產制度。「世襲君主制」（家產制）對中國的行政和文化都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實質上正是這種結構層面的特性在極大程度上塑造了人們意識的獨特性。可以說，在對中國現代進程的關注中，兩者其實談到了影響同一問題的兩個面向。

順著民族精神的角度，羅斯分析認為，西方的個人主義總是優於中國的大家庭主義。他談到了西方人可以自由的作某種決定，採取某種行動。這種自由的確促進了市場公平精神的發揚以及商業運營的靈活性，並且，這種自由也的確是受制於家庭的義務和被親屬關係所牽絆的中國人嚮往的，但書中提到的一個現象卻恰恰與之有所矛盾：中國的碼頭工人在經濟蕭條時

總是能度過難關，不是因為他們找到了其他工作，而是因為其中大多數人已經分散到了先世聚居的農村，重操前人的舊業，維持生存。羅斯意識到，正是緊密或鬆散的血親關係使碼頭的失業者度過了難關。中國的城市與農村世世代代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從上述事例來看，這種聯繫在社會出現動盪和危機時能起到舒緩的作用，保障個體的生存，不能不說是「大家庭主義」在非常時期的一種獨特功能。就是在今天相信也有其存在的意義。儘管我們深受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但隨著現代性的推進，各種關係會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隨之發生變化。正如羅斯預見的那樣，公共精神的逐步建立，將削弱城市居民對農村家庭的感情。

四 禁煙運動與民間組織

跟隨羅斯遊歷的路線，我們進入了中國西部，也進入了那片曾經開滿罌粟花的土地。學過中國近代史的人都不會對那段歷史陌生，課本裏的敘述大致是，大清帝國的大門被堅船利炮撞開，鴉片戰爭開始了。然而沒有什麼比由一個西方人憂心的描述鴉片的肆虐，更讓國人的胸口隱隱作痛。羅斯說：「我第一次親眼窺見了中華帝國的隱私」（頁146）。書中大量的資料已經足以讓人吃驚。當鴉片煙槍的多少成為衡量一個家庭經濟狀況好壞的標準，成為人們商訂婚嫁時所要瞭解的最主要情況時，所有的資料都顯得蒼白。罌粟花在陽光下搖曳生姿，鴉片種植的繁榮，讓觀者絲毫不會覺察這個國家的暮氣沉沉。不難想見鴉片對這個社會的侵蝕已到了何種地步。羅斯向我們這樣描述：「罌粟花嬌豔迷人，風情萬千，像是技藝高超美艷絕倫的美女蛇，引誘驅使著眾多的追隨者，又像是吸血鬼一般，用她那輕柔的嘴唇攝取著人們的靈魂」（頁157）。富有者用鴉片來消磨乏味的生活，貧窮者用鴉片來緩解肉體的痛苦。慈禧終於在1906年頒佈了禁煙令，然而北京的命令到了地方卻遇到了強大的阻力，並付出了血的代價。作為社會學家的羅斯在此始終保持著學者的客觀態度，他把中國的禁煙運動與西方的禁酒運動作比，認為如果西方當時不採取措施對酗酒之風加以控制，與中國任吸食鴉片肆意所造成的不良後果不會有什麼差別。

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作者指出，即使政府在禁煙方面束手無策，其他的組織也早應行動起來。但當時的狀況是，中國社會缺乏具有自我保護功能的社會組織，而婦女的被束縛使得她們在社會生活中沒有地位，從而也就難以為保衛家庭做出努力。然而公眾並不是全然麻木的，可喜的變化在於，在危機面前，國人的自私和冷漠，以及缺乏有效合作的局面得到了改觀。書中提到的一個重要的例子，福建組織了禁煙會和戒毒社，他們與政府配合查禁鴉片，並卓有成效。一場戰爭開始了，覺醒的一群人開始團結和組織起來，顯示出巨大的感召力。不過在長期的壓抑下，民間的組織就今天看來仍然十分弱小。面對貧困、教育、醫療，除了家庭，我們需要具有更強大的保護功能的社會組織，這種需要相信在百年後的今天同樣迫切。

五 爭脫枷鎖的婦女

在作者所處的時代，西方人束縛了女性的腰，中國人束縛了女性的腳。束腰的只是西方時髦婦女的十分之一，裹腳的卻是中國十分之九的女性。我親眼見過外婆的裹足，實在談不上什麼美感，腳趾畸形的彎曲，走路活動均不便利，時常疼痛，吃盡了苦頭，所以至今難以理解這種怪癖和荒謬的習俗。

當時的中國婦女大都面對的是，被安排的婚姻以及無力改變的命運。羅斯發現，中國人中自殺的大多數是少婦和年輕的寡婦。在鄉間最好最宏偉的建築不是別的，而是高聳在道間的牌坊。因為思想的閉塞，她們並沒有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痛苦，而這種狀態或許才是最令人痛心的。希望雖然微弱，歷史的車輪總在前行，並且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女子教育的逐步推廣不僅推遲了婚齡，也改變著女性的地位和命運。當更多的女孩進入教會或者官辦的學堂，權利與自由的意識慢慢在越來越多的女性心裏生長起來。畢業的女生中有人成為了教師、護士，甚至校長，但仍有很大一部分回到家庭安排的婚姻，掙脫枷鎖以後的道路依然漫長，任務依然艱巨。

在幸與不幸的比照中，生活在當下的中國婦女可能多少會感到一些慶倖，受教育的權利、通過工作賺取工資的權利、擁有職業生涯的權利，以及作為一個公民所應享有的權利和義務，在過去的一百年中，這一切漸成現實，而在中國農村更廣闊的土地上，生活和勞作著更多的女性，在她們中蘊藏著更大的潛能，但她們中的一部分至今不能在事實上平等的享有受教育的權利。羅斯認為，將來所修的鐵路，所開的礦業，所興的貿易，所有的這些都不及中國女性潛能的發揮給國人所帶來的幸福的一半。其實，羅斯所謂的「潛能」到今天也還未完全發掘，他對中國女性能量的評價也絕不過分，因為女性的幸福是整個人類幸福的一半乃至更多，與這場解放運動相關的工作也仍在繼續。

縱覽全書，內容詳實豐富，摘取其中的若干片段加以品味已讓人回味良多。作為《西方視野裏的中國形象》叢書之一，《中國鄉村生活》、《穿藍色長袍的國度》、《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也屬於該叢書。只是身處又一個轉變階段的中國，閱讀此書顯得獨為有益。因為夜色漸退，光明在前，希望由生，不斷的回望和理解過去，才能更好的關注現在，思考未來。

秦文佳 獲法學碩士學位，現就職於上海財經大學。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六期 2006年11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六期（2006年11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